

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专稿(一)

引文格式: 余文华, 何银萍. 风险管控: 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再思考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1(3): 1-9.

风险管控: 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再思考

余文华, 何银萍

摘要: 如何实施新经济政策而又不危及工农苏维埃政权, 是列宁晚年一直关注且试图解决的重大课题, 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探索: 第一, 明确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性质, 在执行时间上对其做了约束规定; 第二, 设定新经济政策的“退却”限度, 以求政策的稳妥性和局面的可控性; 第三, 要求共产党人通过学习增强本领, 以便更好地贯彻新经济政策; 第四, 提出加强法制建设, 用法律预防和惩治滥用新经济政策的行为; 第五, 强调苏维埃政权在劳资关系中要全力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积极利用和风险管控构成了新经济政策理论的两个方面, 全面准确把握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不能顾此失彼。

关键词: 列宁; 新经济政策; 战略退却; 风险管控

作者简介: 余文华, 法学博士, 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何银萍, 安徽工程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9BKS015);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习近平意识形态治理思想的总体性特征和发展逻辑研究”(SK2018A0102); 安徽工程大学校级科研项目“社会热点与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结合研究”(Xjky0192019012)。

中图分类号: A82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0.03.001

实施新经济政策是十月革命后列宁探索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条重要经验^[1]。目前, 我国学界关于列宁新经济政策研究成果丰硕, 但大多仅从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积极利用的一面展开讨论和研究, 鲜有系统论及新经济政策的另一面, 即列宁防范化解新经济政策风险的思想。在列宁看来, 新经济政策虽有助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但其本身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 尤其是不可避免地带来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和增强, 并进而引发一系列诸如滥用新经济政策、劳资冲突等新矛盾。对于一个刚刚从战争泥潭中抽身, 国内矛盾错综复杂, 国际上又时刻被帝国主义国家所包围和敌视的初生政权来说, 政策举措稍有不当, 就有动摇苏维埃政权根基的危险。所以, 列宁在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相关论述中, 自始至终无不流露出对新经济政策可能给新生政权带来风险的估计和忧虑, 强调新经济政策下同资本主义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阐述了防范化解新经济政策风险的诸多重要举措。应该说, 对新经济政策的积极利用和风险管控构成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的两个方面, 忽略或过分强调其中任何一个方面, 都无法全面准确反映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理论。

一、明确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性质

新经济政策是缺乏大工业基础的苏维埃俄国因无法实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采取的一种迂回间接途径。列宁将其形容为过渡性的战略退却,退却是为将来更有基础地再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这就对苏维埃政权实施新经济政策做了时间上的约束规定。

俄国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关键性一步,但随即到来的国内战争打断了列宁及苏俄政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深入思考。赢得战争的胜利,巩固苏维埃政权成为当时一切工作的中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应运而生。随着国内战争的基本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弊端日益显现,工农群众普遍不满,农村农民暴动不断,城市工潮更是频繁爆发,国民经济濒临崩溃^[2]。虽说战时共产主义是当初为适应战时需要而被迫制定的政策,但列宁也承认:“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 and 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3]187}苏维埃俄国是一个小农业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尤其在接连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后,其国内大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劳动群众的生活极为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领导小生产者向社会化的、集体的、公社的劳动过渡,在理论上毫无疑问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实际执行时就无法保证实现这一过渡。列宁深刻认识到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明显比拥有大工业大生产的国家要困难得多^{[4]24}。在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深入反思之后,列宁得出结论:“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4]208-209}

列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当原先的政策已不能再适应客观条件变化时,总能适时而又迅速地做出调整。鉴于俄国落后的小生产经济国情,简单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现实的,必须采取一套复杂的迂回办法:一方面通过谋求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合作来加强俄国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应迅速采取措施改善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尤其在俄国大生产、大机器工业建立之前,“就应当保证他们有经营的自由”^{[4]23}。为此,从1921年3月推行粮食税开始,苏维埃俄国在农业、工业、贸易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调整。新经济政策的最大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关系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不免得到复活和发展。但在列宁看来,既然在私人生产和自由交换中无法回避资本主义,就应该利用它来提高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对其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当前苏维埃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5]77}。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并不能获得党内所有同志的理解,甚至一度引发了恐慌。对此,列宁也承认:“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3]242}但当党内有人将新经济政策看作是“倒退到资本主义”之举时,列宁着重强调新经济政策是基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而做的过渡性的“战略退却”。实行“退却”,就是用所谓“新的迂回方法”来恢复国民经济,巩固工农联盟,为最终实行对资本主义的进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3]377}。1922年11月,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进一步生动地诠释了这一“战略退却”:“‘新经济政策’!一个奇怪的名称。这个政策之所以

叫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它在向后转。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退后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5]300}

至于新经济政策要实行多长时间再转入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进攻，列宁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做了不同的估计：“不用说，如果欧洲爆发革命，我们当然会改变政策的”^{[4]336}，因为像法、德这样先进大生产国家会在工业技术方面给予俄国切实的帮助，到那时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基础——大工业的时间必然会缩短；如果没有这些外在的支持，要获得先进的技术设备，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无论如何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才行”^{[4]53}。所以，在推行新经济政策的最初，列宁一直寄希望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多次向党内同志强调过渡到社会主义不需要太长时间，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几年之后，“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5]306}。然而，历史并没有按照列宁所预言的那样发展下去，直到他逝世，欧洲也没有爆发革命的迹象。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列宁对合作社的认识也有了一个深刻的变化，视其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5]366}，并设想通过合作社将占苏俄人口大多数的个体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可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加入合作社也要一二十年的时间^{[5]368}。倘若列宁没有那么早逝世，新经济政策可能还会延续更长时间^[6]。但无论是几年、一二十年还是几十年，新经济政策都是作为缺乏大工业基础的苏俄实行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特殊办法，其最终目的是建立根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绝不是苏维埃俄国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要采取的政策^[7]。

二、设定新经济政策的“退却”限度

新经济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完善的政策体系，而是在列宁不断根据俄国具体实际情况所做的两次“战略退却”中逐步形成。在这过程中，列宁特别注意政策的稳妥性和局面的可控性，强调要把握好“退却”的限度，避免因政策失误或局面失控动摇了苏维埃政权的根基。

列宁一直认为不加约束管理的资本主义是苏维埃政权的最大危险。这一判断促使他把将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纳入国家的掌控之下作为设计新经济政策的前提原则。在新经济政策推行之初，列宁计划把最必需的粮食作为税收征缴，进而再用工业品直接交换农民多余的粮食。考虑到多年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使得苏维埃政府无法立刻恢复大规模国营工厂的生产，非国营小工业的恢复就显得十分必要。但此举带来的结果就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获得发展，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就大大增加。面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列宁特别指出不能禁止这种经济的发展，而应“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4]211}。国家资本主义是列宁为第一次“战略退却”所做的阵地准备。早在十月革命前，他就曾提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8]的重要论断。在其看来，国家资本主义不管在组织管理上还是在生产效益上都强于苏俄现有经济实体，“是集中的，有计算和监督的，社会化的”^[9]经济，如果苏维埃政府能够按照这样的方式发展经济，那么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就有了充足的保证。所以，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主张培植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方面可以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分散性、无政府状态和落后小生产的弊病和风险，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加快实现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党内不少人对列宁的主张提出质疑，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政

权附属品,必然会危害苏维埃政权。为此,列宁在各种场合做了多次解释,强调无产阶级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完全能够做到为俄所用:第一,苏维埃俄国是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其国家资本主义自然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第二,苏维埃政权虽然实行新经济政策,但并不取消国有化,必须保持国有成分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基本生产资料 and 行业仍将为国家所掌控;第三,国家资本主义在形式上完全便于国家计算、监督和控制。当然,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只是列宁为了恢复发展苏俄国民经济采取的暂时手段和途径,目的还是为了平稳渐进地改变旧经济关系,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10]。

当生产领域实行第一次“退却”时,在流通领域列宁还是设想把限于地方产品交换即不通过货币中介作为征集农民多余粮食的主要手段。然而,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行运转的客观规律,既然国家允许农民在纳完税后可以自行出售和交换自己的剩余农产品,却又想人为地将产品流转限制在仅仅同国营工业产品交换的范围之内,是不现实的。没多久,列宁便承认“产品交换”是失败之举,并提出政策还需向后退,退到由国家调节的商业和货币流通。毫无疑问,政策再次后退必然会导致私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但列宁强调,苏维埃政权想要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必须紧紧抓住商业这一重要环节,在不影响苏维埃政权性质的大原则下,可以容许以国家调节为前提的商业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列宁所指的国家调节,主要是通过规定国家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相关机构和群体对其进行监督监察、制定其他相关规章等方式来实现。他相信:“掌握商业,引导商业,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能够做到的。”^{[3]261}

列宁设定的“退却”限度,不仅表现在政策设计上要将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纳入国家的掌控之下,更为关键的是要懂得适时停止退却。1921年11月5日,在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经历两次“退却”以后,他就看出在不久的将来有停止“战略退却”的可能性^{[3]263}。翌年3月,针对党内在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出现的种种神经过敏、无谓奔忙的现象和赶浪头的倾向,列宁在全俄五金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表达了“我们已经可以停止而且正在停止我们所开始的退却”^{[5]8}的计划。在三周后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进一步明确宣布:“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已经结束。”^{[5]89}当然,这里停止退却并非要让苏俄退回到新经济政策之前的状态,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重新部署力量”,以便更好地落实新经济政策^[11]。

另外,在退却的过程中,列宁亦特别要求保持良好的纪律和秩序。他将新经济政策的“战略退却”比作军队在战场上的撤退,认为退却时最危险的就是惊慌失措,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因为进攻时,即使维持不了纪律,大家也都会自觉向前飞奔;但撤退时,却不清楚要退到哪里为止,再加上情绪沮丧,只要有一点惊慌的喊叫,大家都有可能拼命向后逃,其结果必然会断送革命。列宁强调,对于习惯进攻的革命家来说,“退却”是一件难事,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会陷于灰溜溜、近乎惊慌失措的状态,但关键不能人为地散布这种惊慌情绪,否则即使出于好意,也要对其进行严厉的惩罚^{[5]91}。正是在列宁的超前部署之下,新经济政策在推行一年多时间里,虽然发生过局部的混乱和偏差,但总体上进行得还是相当平稳有序的。

三、要求共产党人通过学习增强本领

列宁一直将新经济政策看作是无产阶级与资本家争夺农民的一场重大经济竞赛。在这场竞赛

中，苏维埃政权虽然拥有政治权力和各种资源的优势，但缺少本领。列宁认为，共产党人只有通过不断学习经营和管理知识，贯彻落实好新经济政策，才能在这场经济竞赛中占据主动，并最终赢得巩固工农联盟的胜利。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并最终建立苏维埃政权，正是得益于和农民建立了广泛的联盟。如今，要建设牢固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工人阶级更需要同广大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然而，工农联盟的巩固是以改善经济，满足农民日常生活需要为前提条件，在经济落后的俄国绝不可能马上做到。当苏维埃政权不得不改行新经济政策时，资本主义关系必然会得到加强，工农联盟的巩固就会受到极大挑战。列宁明确表示，“全部问题在于农民跟谁走：跟无产阶级走呢，还是跟资本家走”^{[3]196}，而这一切取决于谁能更有效地建立起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资本家为了追求个人财富要发展同小农经济的结合，无产阶级为了发展国家经济更需要发展同小农经济的结合。列宁将这视为一场决定性意义的经济竞赛，是无产阶级同国内资本家的“最后斗争”。列宁在1922年3月的俄共大会上宣布：“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是在同普通店员、普通资本家和商人的竞赛中取胜”^{[5]84}，“没有任何道路——政治的或其他的道路可以绕行”^{[5]86}。紧迫的客观形势让列宁充分相信，如果共产党员不能比资本家更出色地建立起同农民经济的结合，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苏维埃政权就无法生存下去；如果无产阶级在这场竞赛中战胜了私人资本家，为大多数人争取了利益，必然会获得他们的支持和拥护，不仅政权会得到巩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会有充足的保障^[12]。

新经济政策下苏维埃政权要建立起新经济与农民经济的结合，不仅需要国家政权和各种经济手段作支撑，更需要共产党人有足够的经营和管理本领。但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共产党人缺乏本领是苏维埃政权最明显的短板。1922年3月，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经验教训时指出：与旧社会的店员相比，苏维埃负责经营工作的共产党员缺乏经商本领^{[5]86}；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共产党员也缺乏管理企业的能力，致使企业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并不按照司机所试图控制的那样行使^{[5]89}。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根源主要有两点：一是负责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缺少文化，以至于丝毫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和自己的政权；二是党内存在狂妄自大的心态，尤其一些负责经济工作的共产党员，不仅不懂经营，更没有从头学起的意识。为此，列宁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加强学习，贯彻落实好新经济政策，让无产阶级国家成为一个精明能干的批发商^{[3]187}。

至于如何开展学习，列宁提出以下几点要求：第一，要有学习的紧迫感，尽快兑现对农民的承诺，这事关新经济政策乃至苏维埃政权的命运^{[5]80-81}。第二，要脚踏实地，不惧困难，善于从头学起，作为负责的共产党员，只要认识到这一点，踏踏实实做些平凡的工作，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5]85}。第三，资本家比很多共产党人懂行，共产党员应向资本家学习经济工作，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建成共产主义共和国，否则就没有出路^{[3]204}。第四，要抓住商业这个历史事变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开展学习，必须尽快学会经营，要善于利用商业来巩固同农民的联系^{[5]83}。第五，要把挑选人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去抓，不仅要那些善于同资本家竞赛的共产党员安排到恰当的工作岗位，还要善于使用非共产党人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5]100-101}。除此之外，列宁还要求共产党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掌握科学的方法论，以便适应新的形势与任务^[13]。

四、主张用法律预防和惩治滥用新经济政策的行为

随着苏俄新经济政策的逐步实施，社会上各种超越新经济政策界限的行为时有发生。列宁强

调,只有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完善法律监督,才能惩治滥用新经济政策的犯罪行为,进而规范人们日常的经济活动,保障新经济政策在施行过程中不会出现偏差。

首先,从立法原则上明确无产阶级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主导地位。在苏维埃工农政权制定第一部民法的过程中,列宁曾在1922年2月给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的信中,从立法原则上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国家对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列宁在信中建议苏维埃把革命的法律意识运用到民事法律关系上去,强调苏维埃经济领域中没有私法,任何私人性质的东西都不能予以承认,主张用国家权力废除私人契约^{[3]438}。当得知自己的意见没有引起重视时,列宁又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信,再次阐述了用民法限制和监督新经济政策下的私人资本主义问题,提议加强对私营企业监督的研究,强烈要求废除与国家法律相违背并损害劳动者利益的私人契约^{[3]441}。此外,列宁还特别要求司法人员不能不加批判地照搬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在不影响国家经济活动的前提下,必须按照苏维埃的法律精神对其做一系列的限制。

其次,在立法上划清新经济政策的边界。列宁深刻认识到法律是保障新经济政策在正确轨道上实施而不至于偏离的重要手段。为此,苏维埃法律必须明确做出规定,哪些是合法的新经济政策行为,哪些是滥用新经济政策的违法行为。早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之初,列宁就要求重新审查和修改关于投机倒把活动的一切法令,并明确指出:对于那些接受国家监督的“正当”贸易,必须给予支持;而那些利用各种办法企图逃脱国家掌控、盗窃公共财物的行为,必须给予惩治^{[4]224}。随着新经济政策的第二次退却,贸易自由范围进一步扩大,列宁意识到必须从法律上力求划清新经济政策的边界,这对广大居民是极其重要的问题。随即,苏维埃政权在这一问题上做了大量的立法工作,并专门制定了一个修正案,进一步明确了合法的经济流转与滥用新经济政策之间的界限^{[5]249-250}。在这一过程中,列宁亦强调立法要展现灵活性,现实经济生活中一旦出现了立法前未曾预见到的滥用新经济政策的行为,立法机构人员必须立刻对现有法律做出修正。

最后,在执法上严厉惩治滥用新经济政策的行为。保障新经济政策有效实施而又不被滥用,除了制定相应的法律,还必须严格执法。1921年12月,列宁在《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中,就要求司法机关和人民群众在不影响经营活动的前提下切实做好私营工商业主的监管工作,迫使他们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若发现他们超越了法律界限,即使半点,也要给予严惩^{[3]373}。1922年2月,列宁在给库尔斯基的信中又强调了示范审判的教育意义,要求相关司法机构在俄国一些重大城市组织安排一批示范性的审判活动,以便进一步推动全国各地的人民法院更加高效地惩治滥用新经济政策的犯罪人员,进而告诫广大私营企业主,无产阶级国家允许他们做生意,但必须遵守苏维埃俄国的法律及其精神^{[3]439}。列宁的用意很明确,就是要让无产阶级政权下的资本主义成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帮手,而非威胁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五、强调在劳资关系中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

新经济政策必然导致劳资关系越来越多样化,劳资之间的利益对立和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为此,列宁十分关心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问题,并从工会组织、合同订立、斗争权利等方面提出诸多主张,以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最直接最切身的利益。

第一,工会要从各个方面全力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早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俄共高层曾

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工会的定位问题产生过激烈的争论。有人就提出在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工人阶级利益无须保护的观点。列宁对此极力反对,强调工会在反对苏维埃官僚主义弊病和保护劳动群众利益方面还将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除了国营企业,俄国国内的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也开始逐渐涌现,劳资关系也随之越来越多样化,这就导致劳资对立和冲突不可避免。1922年1月,列宁在《真理报》上刊文谈到新经济政策下的劳资关系时指出,苏维埃政权由于不得不采取新经济政策向社会主义做迂回过渡,不但容许而且还发展以国家调节为前提的商业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就导致“即使这种调节十分成功,劳资之间阶级利益的对立无疑还是存在的”^{[3]377}。此外,国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实行商业原则后,“必然会产生本位利益和过于热衷本位利益的现象”,“难免造成工人群众同国营企业的经理即管理人员或同企业主管部门在利益上的某种对立”^{[3]378}。为此,列宁提出工会要在这种劳资对立和矛盾冲突中发挥积极作用,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不受侵犯。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不受侵犯,并不意味着工会可以直接干预企业的运行和管理。列宁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要求工会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能只狭隘地关注本部门的利益,必须“着眼于劳动和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切实发挥好共产党和劳动群众之间的传动装置作用^[14]。

第二,通过订立合同的形式保障工人的基本利益。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之初,列宁就要求把“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作为订立租让合同的基本原则之一,以便在合同谈判中争取工人利益。1921年4月,列宁在一次会议上谈到订立租让合同的基本原则时,明确提出要保障工人基本利益。因为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在工人目前的生活状况下,要想提高生产率是完全不可能的”^{[4]156}。由于俄国物资匮乏,完全依靠俄国自身在最近几年内根本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是不可能的,而承租人拥有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责任和能力。为此,列宁主张承租人应当从国外为自己承租企业的工人输送一切生活消费资料,其价格不能高于成本加一定的附加费^{[4]157}。正是在列宁的主导之下,这些保障租让企业工人利益的条款被纳入租让合同当中,并获得人民委员会的通过。同时,列宁要求工会在订立租让合同中要发挥积极作用,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租让合同的实际条件上,放在对改善工人和农民生活状况有利的实际办法上。

第三,无产阶级政权下工人阶级仍拥有斗争的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资双方爆发激烈冲突时,罢工一直是无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最有力的斗争方式。如今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工人还能不能罢工的问题一度在俄共党内高层引起激烈争论。对此,列宁明确表示,罢工“是我们仍然保留着的权利”^{[4]182}。在1922年1月17日的《真理报》上,列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就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人罢工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经济文化落后的苏俄还没有完成工业和农业的电气化,正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产生的根源没有完全消除,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罢工斗争不能放弃。进而,列宁着重强调无产阶级政权下的罢工斗争与资产阶级政权下的罢工斗争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资产阶级政权下,工人罢工斗争是以破坏国家机构,并最终推翻资本家政权为根本目的;而在苏俄当前的状况下,罢工斗争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罢工的原因只能是国家机构还存在官僚主义弊病和资本主义旧残余,以及“劳动群众在政治上不开展和文化落后”,随着国家机构的不断改革,以及劳动群众政治上的成熟和文化水平的进步,解决劳资之间的对立冲突“应当愈来愈多地采取由劳动者直接投诉国家机关这种正常的方式”^{[3]378-379}。显然,列宁虽对罢工斗争持支持态度,但并不会一味鼓励工人进行这种斗争^[15]。他

深知,工人安心工作、企业稳定生产是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前提,无产阶级政权下的罢工斗争只能是过渡型无产阶级国家阶级斗争的一种短期非正常方式,而非常用方式。

六、结语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全面准确把握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不可忽视其在防范化解新经济政策风险方面所做的一些设想和主张。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关于防范化解新经济政策风险的一些设想和主张主要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俄国国情而做出的判断,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不免有其局限性。比如,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将商业简单看作资本主义行为而时刻加以防范等。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抹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意义。

我国也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正是得益于我们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始终都能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当前,中华民族正处于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关键时期,将强未强之际正是风险易发期。为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告诫全党“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16]。所以,从风险管控的角度再次回顾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对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一是只有时刻保持忧患和危机意识,才能掌握防范化解各种风险的主动权;二是只有不断通过学习来增强共产党的执政本领,才能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种风险和矛盾;三是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能铸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强大后盾;四是只有按照既定战略规划循序渐进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在根本问题上不易犯颠覆性的错误。

参考文献:

- [1] 石镇平,王敏旋.迂回过渡与战略性的退却:解读列宁新经济政策[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2(4):17-22.
- [2] 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上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38.
- [3] 列宁全集:第4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4] 列宁全集:第4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5] 列宁全集:第4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6] 高放.列宁预计新经济政策要实行多久?[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2):23-24.
- [7] 有林.重读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10):4-8.
- [8] 列宁全集:第3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17.
- [9] 列宁全集:第3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36.
- [10] 俞良早.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开辟新航路的统一:论列宁理论与实践精神[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4(6):71-83.
- [11] 刘书林.清醒的退却,坚定的原则:重新解读列宁的新经济政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1):26-31.
- [12] 李文清,田红超.列宁的党群关系思想及其现实启示[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9(2):1-8.
- [13] 俞良早.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关于共产党人学习的任务和要求[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9(5):19-23.
- [14]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4.
- [15] 郑异凡.列宁论工会要捍卫工人的利益[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14(4):28-31.
- [16] 张洋.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N].人民日报,2019-01-22(1).

Risk Control: Rethinking Lenin's Theory of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Yu Wenhua, He Jinping

Abstract: How to carry out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without endangering the Soviet regime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was a major issue that Lenin had been concerned about in his later years, and a series of important explorations had been carried out for this purpose. First, the transitional nature of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was clarified and its implementation time was restricted. Second, the “retreat” limit of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was set, which ensured the stability of the policy and the controllability of the situation. Third, communists were required to enhance their ability through learning so as to better implement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Four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was strengthened to prevent and punish the abuse of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Fifth, the Soviet regime was emphasized to fully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laboring masses in labor relations. Lenin's active use and risk prevention of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constitute two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The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Lenin's theory of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cannot attend to one aspect and lose sight of the other.

Keywords: Lenin; new economic policy; strategic retreat; risk control

（收稿日期：2019-12-12；责任编辑：晏小敏）